

红流纪事

青春热血报国情

一二·九运动

武国友/主 编 桑东华 桑秀芹/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热血报国情:一二·九运动/武国友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3

(红流纪事)

ISBN 978-7-5472-0485-6

I. ①青… II. ①武… III. ①一二九运动—史料

IV. ①K264.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618号



红流纪事

青春热血报国情

一二·九运动

QINGCHUNREXUEBAOGUOQING
YIERJIUYUNDONG

主 编/武国友

著 者/桑东华 桑秀芹

出版人/徐 潜

责任编辑/康迈伦

责任校对/李洁华

装帧设计/柳甬泽 徐 震

印装/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82千字

印张/8.75

版次/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86037516 13578885062

www.jlws.com.cn

书号/ISBN 978-7-5472-0485-6

定价/17.50元

丛书主编/武国友

副主编/王绍强 陈毓述 史义军

著者/桑东华 桑秀芹

编委会

主任/武国友

副主任/程舒伟 鲁晓红 王绍强

委员/周振华 赵丽君 杨兴朝 徐连英

智金华 殷明星 任曼劼 杨燕华

吴宝林 张宇英 马 铃

总 序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走过了长达28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我们组织编写了《红流纪事》丛书，以志纪念。

近些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各类党史著作数以千计。但在已出版的著作中，将一些重大事件独立写成本综合性的小册子，合起来形成一套丛书，目前尚不多见。将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融合在一起，以此为骨架来展现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吧。

选择中共党史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需要做些筛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很多，我们这套《红流纪事》丛书所选之“重大事件”，只选择了民主革命28年历史当中30件大事，力求通过这30件大事大体上涵盖中共党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这首先就遇到了选取哪些事件最为合适的问题。就我们的水平而言，很难说就一定能够选得那么准确、恰当。但总体设想是，应以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为主，有的也可侧重总结某些历史经验或教训。

在选取事件的过程中，除以上一些考虑之外，经过反复综合、权衡，觉得还应有下列标准：一是体现重要性。也就是说，所选事件要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二是注重代表性。所说的代表性，就是某件事可能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影响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它可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对这样的事件也选取了一些。三是注重平衡性。所说的平衡性有两层意思：其一，处理好事件与事件之间的

交叉。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些重大事件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因受事件独立性的限制，相互之间必须避免重复。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撰稿过程中，通过详略取舍的办法作了一些处理。其二，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中共早期组织，工农运动、军事斗争，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各苏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各大战役，等等，都有所选取，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尽管作了上述一些考虑，但由于每一小册子都是以某一事件为中心独立成册的，所选事件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已出版的党史书籍。通过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直书。严格地说，这套书还不算是一套学术著作，而是一套近乎通俗性的读物。努力做到既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又力求文字朴实、通俗易懂，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目前这套丛书与我们的初衷还有一定距离，与读者的期望还会有很大差距，我们在此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谅解。当然，也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此书的同仁、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编 者

2011年3月于北京



严重的民族危机

(一) 祖国危急! 华北危急!

一二·九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又一光辉篇章。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进行侵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计划，蓄谋已久。早在 1927 年的“田中奏折”中就明目张胆地说：“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根据这个侵略计划，1931 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向中国东北的大举进攻。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政策下，仅在两三个月内，日寇便占领了东北三省。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又向内地进攻，企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下，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再妥协退让，继续执行“绝对不抵抗”政策。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侵逼南京。1月30日，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蒋介石通电全国，命令他的部队不得“轻动”。1933年1月，华北的战略要地“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失守。3月初，热河省省会承德又遭敌攻占，日军逼临长城各口。继东北沦陷之后，仅在一年半之间，华北又复门户洞开。中华民族遭受着深重的民族灾难。

面临民族危亡，中国广大人民高举抗日大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工人、农民组织起了数十万的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日资工厂10万工人发动了大罢工，协助十九路军作战，坚持一个半月以上。九一八事变后，广大学生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也从国民党政府中分裂出来，起而抗战。

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相反，国民党政府却置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利益于不顾，一方面不断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一方面对共产党、红军和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从1930年到1934年，正值民族危亡的时刻，蒋介石派了重兵连续五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

剿”，对红色区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在白区则颁布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施行条例”，并大发其“三天亡国”的谬论，声言“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济南、杭州、汉口等地3万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出兵抗日，蒋介石却命令军警宪兵开枪镇压。蒋介石更利用蓝衣社等组织对爱国进步人士施行恐怖手段，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会长杨杏佛、《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相继被特务暗杀，左翼作家也不断遭到逮捕和杀害。整个白区成了一座黑暗的牢狱，抗日分子的生命朝不保夕。

1933年5月12日，日寇又占领通州，侵逼平津，华北告急！蒋介石非但不下令抵抗，反而与日寇于5月31日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的合法性，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非武装区”，任凭日军自由出入。这样，偌大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直取平津。

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塘沽协定》签订之后，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表了一个目的在于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公开叫嚣日本是东亚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中国不得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而蒋介石政府却发表声明说：“中国……从无欲中伤任何他国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表示愿意牺牲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独立，接受这种“保护”，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6月9日，国民党政府派其驻华北的代表、亲日派头子

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了驻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等等。从此,日寇便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实际控制了华北。

《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华北局势十分险恶。关东军向长城各口大量增兵,日寇收买汉奸,策动了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制造一个“满洲第二”。1935年10月22日,日寇制造了“香河事变”,指使河北省东部的香河、三河、宝坻、武清等县汉奸暴动,占领香河县城,由少数汉奸劣绅组织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同时,日本特务也分赴北平、济南、保定等地进行阴谋活动,威胁地方当局,收买汉奸,策动伪自治运动,将冀、鲁、晋、察、绥华北五省据为己有。一个月之后,原为国民党特派的“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离北平40里的通州,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牌子,并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这样,冀东20余县的大片国土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统治。在天津,日寇在南郊八里台子修建飞机场,在大沽口修筑军用仓库,在市内修建兵营。11月11日,天津的日本报纸公然发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的消息,鼓吹“厉行冀、鲁、晋、察、绥五省自治”,一小撮汉奸、亲日分子就奴颜婢膝地通电响应。华北和平津两市,眼看行将易帜。

日本帝国主义不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控制了整个华北。人民遭受日寇的残酷蹂躏,而大大小小的卖国贼,却仗势欺人,狐假

虎威。人们曾经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描绘当时的情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共同的呼声

1935年的华北，已是名存实亡。地处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和天津的人们，尤感切肤之痛。

天津，这个华北的重要港口，从1927年起就有日本的驻屯步兵队，1935年又在增兵，扩建军营。日本军人和特务经常耀武扬威地出没在市区，汉奸越发狐假虎威，为非作歹。

北平，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也在蒙受着耻辱。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北平的城门洞口，大街小巷，布满了日军岗哨。兽蹄所到之处鸡犬不宁，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日军经常在郊区夜以继日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农田民舍多被焚毁，居民不断伤亡。北平前门车站熙来攘往，国民党的军政显要携带金银细软和眷属，争相南下。故宫的古物，继续南迁。各大学当局纷纷准备撤退，清华大学要迁长沙，东北大学要迁太原，教育界正准备上“最后的一课”。人们不知何时大难临头，谣诼纷纭，早上听说下午日军要占北平城，下午又传说晚上来。真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到处呈现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

险恶的形势冲击、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特别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北平大中学校的爱国进步青年学生，不能不惦念着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他们目睹险象环生的华北局势，痛感华北危在旦夕，国家将亡，悲愤和

屈辱、不安和苦闷，交织在一起，胸中燃烧着熊熊的抗日怒火。然而，北平各大报纸，却只登一些国民党的官方消息，登一些对日妥协退让的言论，所谓“华北特殊化”问题，一字不载。人们心怀疑虑地探听着消息：华北“特殊化”到底是哪五省？有没有平津？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四个师长怎么样？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怎样进逼？……一连串的问号，迫使着爱国青年学生们思考着“怎么办？”“怎么办？”，他们有时是愤慨的控诉，有时是低声的沉吟，有时是渺茫的希望，有时是焦躁的唾骂。国民党不抵抗，而且不许群众抗日。爱国有罪，卖国却有赏。这是何等的天日啊，天若有情，亦当共愤！

险恶的形势向每一个爱国者提出了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问题。青年学生们时刻悬念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即使那些素来埋头用功的学生，也情不自禁地投入这动荡不安的激流，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北平的学生悲愤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教室、在宿舍，青年们常常怀着沉重的心情，时而激昂高亢地歌唱、时而沉痛地低吟着最为流行的救亡歌曲《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学生，包括燕京大学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龚澎、龚普生，北京大学的俞启威（黄敬），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东北大学的宋黎等，经常在美国进步记者兼燕京大学讲师埃德加·斯诺家里聚会。这些大学生，有的是失去关系的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他们利用这个环境讨论时局，并从斯诺那里获得一些被国民党封锁了的国内外消息，如日本人的动向，宋哲元的暧昧态度，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等。他们曾怀着苦闷的心情给孙夫人宋庆龄写过一封信，请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去上海时捎给孙夫人。孙夫人回信说：“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

是的，青年人也早就考虑到要行动了。严峻的现实一再告诉他们：除了反抗，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从内心发出誓言：甘洒热血献中华！

1935年11月1日，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私立北平汇文中学、私立北平贝满女子中学、私立天津中西

女子中学、私立天津汇文中学等 10 所学校学生自治会发出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中写道：莫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 30 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岐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平津十校的《宣言》吁请国民党政府以“其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宣言》是广大青年对国民党统治的控诉状，也是他们为争取爱国自由、抗日救国的呼吁书。这个《宣言》表达了大家要求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拨动了平津数万学生的心弦。

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学生共同的呼声。革命如行将爆发的火山，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三）战斗的前夜

九一八事变以来，平津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破坏和摧残。到 1934 年底，全北平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只有 10 多人，加上共青团员也不过 20 余人。1935 年初，北平的地下党员与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河北省取得了联系，河北省委派李常青来到北平，不久，组成了由彭涛等为领导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领导革命斗争。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是在我党领导下的外围秘密组织，有七八十个会员，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其中有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姚依林、黄诚，中国大学的董毓华，北平女一中的郭明秋，镜湖中学的孙敬文、刘杰等。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在其他地区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也跑到北平来找党的关系，坚持革命斗争。黄敬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原是中共青岛市委成员，被捕出狱后，从山东济南来到北平，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

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当时一般青年的思想是比较混乱的。他们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家将亡的景象，加上失学失业的痛苦，思想陷于苦闷与彷徨之中。一部分学生感到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暗淡，个人也没有出路。有的甚至受了国民党散布的逃跑主义的影响，想退到云南、贵州去。有的对日寇烧杀淫掠的罪行和国民党血腥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倒行逆施，产生了畏怯和恐惧的情绪，幻想着逃避斗争。针对这些思想，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中国反帝大同盟、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包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世界语联盟”。简称“八大联”）、赤色互济会等秘密团体，在华北人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团结教育群众，积聚革命力量。

同时，党也利用某些公开合法的形式进行活动。一些大中学生和进步青年被吸引到“左联”、“社联”、“语联”等秘密组织或世界语学会、新文学研究会、读书会、时事座谈会等公开活动中去。在这些组织里，

通过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作用，领导大家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如“中国这样发展下去前途如何？”、“华北是否名存实亡？”等问题，并进而向学生们提出了“国民党不抵抗，步步退让，当前国难重重，能不能安心读书？”“国家这么黑暗，青年人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启发着同学们逐步认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自己救亡图存的责任。这些组织还引导大家讨论当前的国际形势，认识世界人民强大的反帝力量。特别是阿比西尼亚以 800 万人的小国，却英勇地抗击了法西斯强盗意大利帝国主义的侵略，通过事实给予群众以深刻的教育。在这些组织影响下的群众，经过一系列自我教育，消除了怯懦心理，提高了抗日觉悟，振奋了民族精神。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尖锐地分析了当时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发动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愿望和意志。

《八一宣言》透过国民党反动政府严密的新闻封锁，传到了白区的北平、上海等地。一些进步学生从北京饭店的法文图书馆买回刊登有

《八一宣言》的《共产国际通讯》后，如获至宝，秘密地传阅着。在清华大学的布告栏上，半夜里公开贴出了《八一宣言》；在师范大学，学生们清晨到盥洗室洗脸的时候，发现每个脸盆里都放了一张《八一宣言》，大家争相传阅着，私下议论着。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迅速扩大。

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华北广大农村被淹，广大农民饥贫交困，流离失所。在王府井、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逃到北平的灾民。党的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号召组织群众防御水灾自救团体或水灾会，进行广泛的救灾活动。于是，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便通过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正式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中组织赈济黄河水灾的活动。“黄河水灾赈济会”联系了一批学校的进步青年学生，将二三十个被敌人搞垮了组织的学校，逐渐集中起来。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女一中、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大中学校也都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分会”。学生们公开在大街小巷开展救济灾民募捐活动，组织义演，为灾民募款募实物。与此同时，各校派出代表，携带捐款、实物和抗日宣传品，分赴灾区，进行慰问。随后，各校都公开地展开了救灾宣传活动。水灾赈济活动体现了进步青年学生在国难当头、华北危急之时，与劳动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精神。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北平女一中的郭明秋被选举担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任秘书长，镜湖中学的孙敬文任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鲁风任总纠察，燕京大学的王汝梅（黄华）任总交际。公开领导学生运动的组织核心就形成了。北平学联的建立，成为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新起点。

此时，华北形势已经非常严重。新的抗日救国运动已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在无数个北风呼啸的夜里，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在北平西城辟才胡同附近的一个洋车厂里，秘密举行会议，会议经常开到东方发白。他们研究了当前紧迫的形势和广大群众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一致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国运动，以宣传教育更广大的群众，并向反动统治者示威。一个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即将兴起。

12月6日，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东北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三院、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私立朝阳学院、私立华北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私立北平今是中学、私立北平艺文中学、私立北平崇实中学15所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了《北平各校通电》。《通电》痛陈了自“华北事变”以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连串辱国丧权的事件，尖锐地指出：“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通电》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发出呼喊：“是知我之力固足以抵抗也，今而急起，事尚可为；若再因循，后将无及矣！”《通电》最后写道：“吾民置身危城，日受熬煎，顾瞻前途，已不能再事容忍，愿对政府作如左之请求，希国人共起督促之：（1）誓死反对‘防共自治’。请政府即下令讨伐叛逆殷汝耕！（2）请政府宣布对敌外交政策！（3）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4）请政府切实解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

这时，有消息传来，国民党政府准备将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